

《史记》战国人物

取材研究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任刚著

西安工程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史记》战国人物取材研究

任刚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史记》战国人物取材研究 / 任刚著.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4-09109-0

I. ①史… II. ①任… III. ①史记—历史人物—人物
研究 IV. ①K8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8809号

《史记》战国人物取材研究

作 者 任 刚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32开 12.875印张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978-7-224-09109-0
定 价 20.00元

序

霍松林

研读《史记》的途径很多，我觉得从取材角度研读是最好的途径之一，因为这带有寻根究底的意思，历代《史记》研究大家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先探讨取材就可以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比如，某一个历史人物的材料可以有很多，为什么司马迁选此而不选彼，往往与司马迁的思想与《史记》宗旨等有直接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史记》所有的问题都可已归结到取材。过去史学界流行傅斯年先生的一句话：“史学就是史料学”，虽有一定的夸大之处，但就史料对一部史书的价值而言，是有道理的。

任刚第一次向我汇报他的这个题目时，我没有表态，让他先不急，再想想。原因是这个题目有些难，担心他做不完。但是，后来我看他有坚持之意，目的是想把这个题目做下去，想在宝贵的读博期间为以后的研究打一个基础，心正意诚，精神可贵，我就同意了，并给他鼓励和支持。现在，战国这段（楚汉时期作为附录）写出来了，要出版，我作为导师，乐意写几句话。

从现在的古典文学研究的实际看，有些传统题目前人似乎已经作了，但如果深入进去的话，往往你会发现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史记》取材，从扬雄、班固开始，到诸如“三家注”、《史记》

评林》、《史记志疑》等,一直到现代的《史记会注考证》、《史记笺证》等都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有不足:那就是将《史记》取材作为附属研究对象,而不是集中、专门的探讨。以以上诸书为代表的《史记》研究论著,在《史记》取材上积累的大量研究成果,有进一步从总体上总结和把握的必要。此外,历代对《史记》材料来源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文字材料上,对非文字材料重视不足,而非文字材料对《史记》的影响很大。从司马迁、《史记》的思想体系对《史记》取材进行把握总结,到目前为止专门、集中的探讨还不多。这个研究空间还是有的。当然,也有一点难度。另外,近年来与《史记》有关的出土文物、文献也积累了不少,典型的如《帛书战国策》、《孙膑兵法》等,都和《史记》取材有直接关系,这也提出了对《史记》取材研究进行补充的问题,这个空间也是有的。

《史记》取材的探讨,当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真积力久、持之以恒,不急功,不近利,客观、仔细地对有关文献进行梳理、鉴别、分析,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以上的意见,既是我对任刚选题和文章的肯定,同时也是我对他以后有关研究提出的希望,希望他能将此题目继续深入地搞下去,争取将来能拿出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成果。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集中探讨《史记》战国人物材料来源的著作。《史记》取材,从扬雄、班固开始,到诸如“三家注”、《史记评林》、《史记志疑》等,一直到现代的《史记探源》、《史记会注考证》,《史记笺证》等都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有不足:那就是将《史记》取材作为附属研究对象,而不是集中、专门的探讨。本课题在古今有关《史记》取材成果的基础上又回避其不足,将有关文字材料和非文字材料结合起来,对战国及秦楚之际的人物材料来源进行探讨;同时也结合了近年来出土文物及文献,补充了学界在《史记》取材探讨上存在的不足。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主要探讨司马迁对《史记》取材的论述。从有关论述可以看出,取材对《史记》的重要性,取材是《史记》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学界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

第二章从总体上把握战国时代人物取材的特点。从时代说,战国时代是一个是非颇谬于圣人的时代,这也表现在《史记》的取材上:整齐百家杂语。从文字材料上说,除了秦国的史书《秦记》外,就是“战国之权变”及诸子之书,“战国之权变”的主流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相谬,诸子亦各言其道。非文字材料

主要来源于司马迁的调查研究。人物材料的特点，秦的人物比较翔实，六国人物采用传说的成分多一些。

第三、四两章对具体的人物取材作考察。主要从文字材料和非文字材料两个方面着眼，战国人物传记的取材是在文字材料和非文字材料的相互影响下进行的。

附录对秦汉之际人物取材作一些考察。文字材料主要来自陆贾的《楚汉春秋》。来源于调查研究的非文字材料，对这段历史时期人物传记撰写的影响也十分大，取材的总特点也是“整齐百家杂语”。因为《楚汉春秋》已佚，所以只能蠡测，以《淮阴侯列传》为例，对此进行了集中分析。学界有关的研究并不多。

目 录

| | |
|--------------------------------|------------|
| 引 言 | 1 |
| 一、选题意义及设想 | 1 |
| 二、《史记》取材研究回顾 | 3 |
| 第一章 司马迁对《史记》取材的论述 | 30 |
| 第一节 司马迁自述《史记》取材途径和方式 | 31 |
| 一、司马迁谈取材 | 31 |
| 二、厥协六经异传 | 55 |
| 三、整齐百家杂语 | 65 |
| 四、调查研究 | 77 |
| 五、“通”的取材总则 | 96 |
| 第二节 司马迁自述取材过程 | 103 |
| 一、概说 | 103 |
| 二、司马迁自述取材过程 | 115 |
| 第二章 战国人物取材概述 | 131 |
| 第一节 “是非颇谬于圣人”的时代 | 132 |
| 一、“是非颇谬于圣人”的时代 | 132 |
| 二、“是非颇谬于圣人”的人们 | 134 |
| 第二节 战国时代的文字材料 | 139 |
| 一、百家杂语 | 139 |
| 二、《秦记》、“战国之权变” | 141 |
| 第三节 战国时期的非文字材料 | 149 |
| 一、非文字材料的特点 | 149 |

| | |
|----------------------------|------------|
| 二、司马迁的家族因素 | 154 |
| 第四节 战国人物取材特点 | 164 |
| 一、秦国人物 | 164 |
| 二、六国人物 | 169 |
| 三、战国人物取材特点 | 176 |
| 第三章 战国人物取材(上) | 179 |
| 第一节 论其行事所施设者 | 179 |
| 一、兵家人物取材 | 185 |
| 二、法家人物取材 | 231 |
| 三、道家人物取材 | 248 |
| 第二节 以其书细剖其心迹 | 252 |
| 一、《屈原列传》取材 | 253 |
| 二、《乐毅列传》取材 | 261 |
| 第三节 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 | 265 |
| 一、纵横家概说 | 265 |
| 二、《苏秦列传》取材 | 270 |
| 三、《张仪列传》取材 | 285 |
| 四、范雎、蔡泽的取材 | 300 |
| 五、《鲁仲连列传》取材 | 308 |
| 六、虞卿传取材 | 312 |
| 第四章 战国人物取材(下) | 315 |
| 第一节 《孟尝君列传》取材 | 317 |
| 一、司马迁对孟尝君的认识 | 317 |
| 二、《孟尝君列传》取材 | 320 |
| 第二节 《平原君列传》取材 | 331 |
| 一、司马迁对平原君的认识 | 331 |

| | |
|-----------------------------|-----|
| 二、《平原君列传》取材 | 333 |
| 第三节 《春申君列传》取材 | 337 |
| 一、司马迁对春申君的认识 | 337 |
| 二、《春申君列传》取材 | 338 |
| 第四节 其他人物取材 | 340 |
| 一、《蒙恬列传》取材 | 340 |
| 二、《吕不韦列传》取材 | 343 |
| 三、《魏公子列传》等取材 | 345 |
| 结语 “整齐百家杂语”与“是非颇谬于圣人” | 351 |
| 附录 秦汉之际人物取材蠡测 | 355 |
| 一、秦汉之际的史料特点 | 355 |
| (一)历史特点 | 355 |
| (二)史料特点 | 359 |
| (三)文字材料的倾向性 | 361 |
| (四)非文字材料的倾向性 | 373 |
| (五)司马迁的倾向性 | 379 |
| 二、非文字材料对《淮阴侯列传》的影响 | 380 |
| (一)《淮阴侯列传》的文字材料 | 381 |
| (二)非文字材料对《淮阴侯列传》的影响 | 383 |
| 主要参考文献 | 391 |
| 后记 | 400 |

引　　言

一、选题意义及设想

在世界历史著作史上，可能很少有史家像司马迁那样频繁地谈到自己著作的取材。作为千秋良史的司马迁不仅大量地具体地谈《史记》的取材，而且还谈取材原则和过程，可谓涉及取材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在《史记》中，作者谈得最多的问题莫过于此。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这充分说明取材的重要性。史学界流行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史学便是史料学”^①，现在尽管学者们对这个观点提出了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但是史料对于历史著作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从这个角度说，取材是《史记》最根本的问题。但是，通过对《史记》研究史的考察，就会发现，学人们对《史记》取材的研究与取材在《史记》中的地位相比，差距还是不小的。这种

^①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2页。

差距首先表现在对《史记》取材的认识不足上。

《史记》取材的研究是《史记》研究史上吸引众多目光的一项内容。从时间上看，最早可推到晚司马迁六十年左右的扬雄，一直延续到现在；从研究内容上看，取材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内容很丰富，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通过对《史记》研究史的考察，我以为，前人的主要着眼点是具体地考察《史记》材料的来源，指出《史记》材料的具体出处。两千多年来，经过学人们的不懈努力，这方面的成就是很大的。但是，通过对前人有关研究成果的考察，就会看出，这种研究存在着一定不足：首先，《史记》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于取材，但学界对于《史记》取材没有专门集中研究，一直附属于其他研究中，这与取材在《史记》中所占的地位不符。其次，相对而言，对《史记》影响很大的非文字材料的重视不足。此外，近年来，与《史记》有关的考古发现不少，一些新出土的文物、文献以及新发现的遗存都和《史记》有关，典型的如《帛书战国策》、《孙膑兵法》等，都与《史记》取材有直接关系，这些都补充了《史记》的材料来源。

本课题在古今有关《史记》取材成果的基础上而又回避其不足，将有关文字材料和非文字材料结合起来，对战国及秦楚之际的人物材料来源进行探讨；同时也结合了近年来出土文物、文献及遗存，补充了学界在《史记》取材探讨上存在的不足。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主要探讨司马迁对《史记》取材的论述。从有关论述可以看出，取材对《史记》的重要性，取材是《史记》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但学界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

第二章从总体上把握战国时代人物取材的特点。从时代

说，战国时代是一个是非颇缪于圣人的时代，这也表现在《史记》的取材上：整齐百家杂语。从文字材料上说，除了秦国的史书《秦记》外，就是“战国之权变”及诸子著作，“战国之权变”的主要思想和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相缪，诸子亦各言其道。非文字材料主要来源于司马迁的调查研究。人物材料的特点，秦国人物比较翔实，六国人物采用传说的成分多一些。

第三、四两章对具体的人物取材作考察。主要从文字材料和非文字材料两个方面着眼，战国人物传记的取材是在文字材料和非文字材料的相互影响下进行的。第三章侧重于文字材料的考察，第四章侧重于非文字材料的分析。

附录对秦汉之际人物取材作一些考察。文字材料主要来自陆贾的《楚汉春秋》；来源于调查研究的非文字材料，对这段历史时期人物传记撰写的影响也十分大，取材的总特点也是“整齐百家杂语”。因为《楚汉春秋》已佚，所以只能蠡测，以《淮阴侯列传》为例，对此进行了集中分析。学界有关的研究并不多。

对《史记》人物取材作集中具体探讨的论著，目前学界比较少见。

本书所引《史记》文字，如没有特殊的说明，皆出自1959年9月出版的中华书局标点本。

二、《史记》取材研究回顾

(一) 扬雄、班氏父子奠定《史记》取材研究的基础

真正了解一部史书，必须首先了解其取材。对《史记》

文字材料的溯源性研究，在《史记》产生之后的几十年就已开始，之后一直没有间断过。扬雄对《史记》的评价比较多，而且系统，直接影响了班固父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是非颇缪于经”。《汉书·扬雄传》载扬雄著《法言》的目的时说：“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迄]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缪于经。”首先，扬雄分析了秦汉至当代学术思想倾向“大氐诋訾圣人”的趋势，而将《史记》也置于这一趋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扬雄著《法言》。扬雄以孔子之言作为裁定一切的标准，将《史记》与战国“诸子”并列，特别指出《史记》战国、楚汉之后，“是非颇缪于经”^①。扬雄将《史记》与诸子并提，应当说对《史记》的了解颇深。特别有趣的是扬雄对《史记》的不满，未言六国之前，只言六国之后不与圣人同，这与《史记》取材的总体情况是吻合的：战国之前，《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是非协于经，战国后“整齐百家杂语”，是非颇缪于经。可见，扬雄对《史记》的了解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度。《法言·寡见》又申述同样的观点：“或问：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生不能究其业。曰：若是，则周公惑，孔子贼。”^②这又从《六家要旨》而言《史记》“是非颇缪于经”，从这里似可看出，“是非颇缪

^① 《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第3580页。以后所引皆出自此本。

^② 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3月第1版，第222页。以后所引皆出自此本。

于经”是当时人们对《史记》思想倾向的普遍看法。其次，扬雄认为《史记》的主要内容是六国（战国）以后至当代，见解可谓精到。这些都直接启发了班固。

二是“实录”。最早以“实录”评价《史记》的，当为扬雄。《法言·重黎》：“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公’，曰：‘实录’”^① 中国对史书的肯定，无过于实录者，作为史书而曰“实录”，是对史书最高的评价。扬雄评《史记》为“实录”，很明显是从中国古代对史官和史书的最高评价得来的。他在《法言》中大量地引用《史记》的人和事，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他对《史记》真实性的认可。这样，既曰“是非颇缪于经”，又许之以“实录”之高标，扬雄对《史记》的看法就出现了矛盾。

第三是“爱奇”。《法言·君子》：“乍出乍入，淮南也；问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② “爱奇”是褒？还是贬？从扬雄有关的论述可以看出，基本上是贬的。首先，扬雄将“仲尼多爱”与“子长多爱”做了比较，在“义”和“奇”之间，显然，“义”要高于“奇”；另外扬雄还评价《史记》的“杂”：“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智与？曷其杂也！’曰：‘杂乎杂，人病以多知为杂，惟圣人为不杂’”^③ 由此可见，扬雄所说的“杂”，是贬义的。这和“是非颇缪于经”有关。从根本上说，这也是从取材上评价《史记》的。

^① 《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3月第1版，第413页。

^② 《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3月第1版，第507页。

^③ 《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3月第1版，第163页。

今天如何评价扬雄观点的矛盾呢？首先，“爱奇”“是非颇缪于经”确实是《史记》一大特点，这表明司马迁在审美和思想认识上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会影响取材。从《史记》总体上表现出来的倾向看，司马迁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表现出极大的膺服，这种膺服也表现在取材上面：“折中于夫子”、“考信于六艺”。但“实录”无疑是司马迁著史的最高标准，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相一致，是《史记》取材的最终标准。因此《史记》表现出来的“是非颇缪于经”带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既是“实录”原则使然，也是《史记》宗旨使然。其情形就像作家笔下的人物，一旦成型，就会按照其自身逻辑发展，而不以作家好恶发展一样。也就是说，“是非颇缪于经”未必是司马迁的本意，而是司马迁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必然，时代颇缪于经，作为时代的实录，岂能不缪于经？《史记》颇缪于经不得已也。其次，出可以看出儒家史学思想在“实录”上的保留态度，《春秋》多忌讳，就是明证。由此看出司马迁突破儒家思想束缚的必然性。儒家史学思想上存在的这些缺陷也使得扬雄尽管对《史记》有“是非颇缪于经”的不满，但还是肯定了《史记》。扬雄的观点及其表现出来的矛盾性，在历史上有代表性。

探讨《史记》取材，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班氏父子。班氏父子在刘向、扬雄的基础上，为《史记》的研究确定了基本的范围和内容，班氏父子在《史记》研究上的成就很多，就取材而言，主要表现在对《史记》主要史料来源有非常明确的说明。

班彪《略论》是历史上第一篇集中评论司马迁和《史记》的文章，整篇文章以《史记》为中心立论：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